

高校思政课落实素质教育的文化机理及其实践逻辑

张廷干

(盐城师范学院,江苏盐城 224007)

摘要:高校思政课落实素质教育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内在逻辑并呈现为结构生态,其文化属性有其深刻的根源性依据:生命存在及其超越性与文化的源初关联、文化蕴含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多重属性以及思想文化的创新性生产的统一,而思政课落实素质教育的文化机制则涉及文化“应然”价值与“实然”目标相互转化并潜在着诸多悖论,由此提示了高校思政课落实素质教育的实践逻辑,即:促进思想性和情感性的融合,强化核心价值认同;坚持生活化与超越性的统一,提升理性辨识能力;推动文化场与公共性的融构,涵育深沉家国情怀;保持治理性与体制化的协同,塑造健全人格结构。

关键词:高校思政课;素质教育;文化机理;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2614(2022)09-0126-10

DOI:10.19903/j.cnki.cn23-1074/g.2022.09.021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对教育发展的政策导向和重点要求,这是对“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等世情国情作出重要判断基础上提出的战略要求。高等教育应以其高质量的人才培养而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性环节。“高质量”是综合性范畴,“很大程度上要看数以千万计教师、数以亿计学生的素质能否不断提升和增强”^[1],通过促进人民思想道德素养、法治素养、科学文化素养和心理素养等的不断提升,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教育发展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正向性需求。当前,高等教育“经历了量的快速扩张,质的提升矛盾越来越突出”“关于德育、素质教育的应有地位和科学评价体系没有真正确立起来”^[2]。尽管高等教育已然呈现出一种良好“教育新生态”,但与“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需求仍存在一定差距。课程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体现着国家意志,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作为高等教育课程体系重要部分的政治课,同样存在制约素质教育目标实现的诸多因素。因而,本文探讨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即思政课素质教育目标的结构生态及其文化属性、以文化机制落实素质教育的合理性以及应遵循的实践逻辑。

一、高校思政课素质教育的结构生态及其特征

“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要把立德树人内

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3]。在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思政课作为“信仰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因而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承担着政治与思想引领和价值引领、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以及通过着重提升人的思想政治素养来落实素质教育的重要功能。那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素质教育的概念结构蕴含哪些维度的素质要求?

“素质教育是教育的核心”。围绕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教师、教材和教法、教育体制包括教学评价体系等方面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的要求。从“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再到“六要”标准以及新时代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必须遵循的“八个统一”^[4],都贯穿着一个极为重要的核心价值取向,即如何切实在素质教育上取得真正的突破,有效地落实素质教育,完成打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生力军“梦之队”的重大战略任务。这四个方面的具体要求与思政课程教学目标结合起来,应注重意识形态、学科专业、心智秩序和现实生活等层面素养的全方位生成,这些层面上的素质特征体现为一种结构生态。

(一)意识形态层面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理想信念”结构

大学生具有怎样的思想政治素质、如何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既是思政育人理论与实践的首要问题,也是衡

收稿日期:2021-07-26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基于红色资源的高校思政课育人效果提升研究与实践”(编号:2021JSJG65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廷干,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伦理学与心理学交叉领域的精神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量思政课育人有效性的根本。我们在强调大学生素质的整体性生成时,不能将政治思想标准弱化或遮蔽,这是由思政课的政治性这一最为根本、最为深刻的本质规定性所决定的,引领与强化学生的政治认同构成了基本内容和本质规定性,从而不仅凸显自身相对于其他教育形态独特的意识形态属性,而且必须把对其他素质生成的理解“始终奠定在对其政治性的持守之上”^[5]。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思想政治素质也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生命线^[6]。基于此,道德素质和理想信念才有根本方向和规定性。

一方面,高校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将“‘立德树人’的定位置于‘全面发展’之上,不仅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和德育在学校教育中的突出地位以及道德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7],从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遵循了思政课育人和人才成长的根本规律,即“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8]。

另一方面,在政治思想基础上的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奋斗目标上的深刻反映,是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政治方向的集中体现,对于受教育者成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决定性作用。理想信念教育应坚持以党的初心使命砥砺马克思主义信仰,“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砺着我们党坚毅前行”。坚定的理想信念源于科学理论及其真理性力量。因此,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增强大学生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二) 学科专业层面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创新精神”结构

高校思政课还承载着大学生科学人文精神和创造精神的培育功能。科学素养通常被理解为:尊重科学和客观规律的理性精神、明辨是非和求真务实的自觉意识以及推陈出新和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人文精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衍化为不同意义层面的思想观念和制度理性,其基本的内涵:一是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内在于主体的精神品格,具有“精神气质”与“世界观”的属性。“精神气质(ethos)”是既定文化的道德方面,涉及价值性因素,在宏观方面则指涉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是特定民族的道德风格、审美风格、情绪特征和精神习性的总和,在微观层面则表现为个体的人格、气质和修养;而“世界观(world view)”可归纳为“认知和存在的方面”,“是对纯粹现实的事物存在方式的描画,是自然、自身和社会的概

念”,包含“对秩序的最广泛的观念”^[9]。二是尊重人的自由价值和人格尊严,寻求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的表达。三是在人性理解基础上,更注重超越性价值,即超脱于世俗生活的更高精神生活的追求以及公共性意识等。

值得指出的是:其一,培育大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并不是意味着通过不同课程体系进行,而且更是强调这两种素养以及与之相关的创新精神,是在同一种课程体系中蕴含着的目标要求。在人类文明史上,科学精神是内在于人文精神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而经历了分离进而又寻求人文回归的复杂历程。文明和思想发展史证明:脱离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而缺乏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只是一种残缺的人文精神^[10]。其二,教育活动对超越性人文精神的肯定与追求以克服功利意识和物质取向意识,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共性要求。西方对于人文的强调,至少可以上溯到文艺复兴时代乃至更早,而中国文化传统也特别强调人文教养,正是文化超越性力量使中国有着延续不断的大传统。其三,无论科学精神还是人文精神,都蕴含着理性批判与创新意识。高校思政课程不仅着力于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素养培育的速度和效用,逐渐引导其理念,规范其行为,而且要让大学生能够明辨是非,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立场坚定地批驳谬误,把“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发展为“真正批判的世界观”,由此体现教育机制的转换。其教育策略主要是通过自我表现和反思,“建构既认同又纠正”关系的机制,将自我纠正的程序内化于受教育者心灵深处。

(三) 心智秩序层面的“认知目标—能力提升—价值行为”结构

思政课育人不是停留在知识和原理的层面,而是在知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中提升能力素养,在个体思想道德状况与社会文化价值目标要求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知识—能力—素质”的辩证转化,形成“知识—能力结构”,这是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和价值体系转化的内在要求。就思政课而言,能力素养首要的是政治能力即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能力、政治执行力,还包括知识运用和理论思维能力、协调合作能力、追求美好人生的能力和运用正义感的能力。

认知结构和能力素养在向价值体系的转化同时,也意味着行动与责任担当。内在有价值的存在不能只提供一种心理动机,价值性总是某一情境中的一种行动或作为这一行动的结果,从而使得行动具有承担责任的特点。同样,作为思政课的本质属性,意识形态不仅是思想观念、自我意识深层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表征主体思考客体关系即自己与他人、社会结构和制度、非人类环境或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能力,以及根据对这些关系的认知采取行动的能力。

(四) 现实生活层面的“生命存在—生活意义—自主人格”结构

思政课目标体现在对超越性生活的引领上。生活即教

育,生活世界是真理、价值、意义相统一的实践领域,涵育“生命—生活—人格精神”价值生态。高校思政课是关注生活体验与生活实践,指导创造美好生活,让大学生负责任地持守“生命意识的自由与尊严”,“将多元之善整合到某个融贯的、复杂的整体之中”,蕴含着以“生命自觉—人格自觉—精神自觉”为标识的整全人性:不仅意味着能够正确处理生活价值与精神价值的关系,在文化身份、生活和权利之间建立适当的平衡机制,而且涉及生命的自由与尊严以及人格自觉即自主性。

人之为人的标准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1]。“现代社会的个人应该拥有完整的人格能力,而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人的完整人格的基础”,“完整人格是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外在表现”^[12]。由此可以持续获得“合理的生活指导的意识结构”,既限制那种远离日常生活世界的超验性倾向,又避免把生命与生活简单还原为生存从而防止在世俗世界中沉沦,适当“远离”并超越日常生活,赋予生活以价值与意义。

二、高校思政课素质教育的文化机理及其困境

(一) 思政课素质教育目标的文化属性

1. 生命存在及其超越性特征与文化的本源相关性

(1) 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和人的生命及其本质力量的提升相一致。一是文化与生命存在同源。文化所表征的社会和价值秩序,关联着自然的力量和秩序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上,由“无意识的合目的性”向人的“有意识的目的性”生命活动的转化。文化现象的机制在于:价值的“分—合”,即敬重并持守那些有益于人的生命存在和发展的正价值,以有限的利益、效用乃至超功利的终极性价值,安排人生与社会的价值序列。二是人性并非等同于人的本质。由人性到本质力量的提升是一个文化的过程,“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文化价值指导人们建立正确思想关系,从而提升人的精神本性,也就是将社会历史性的精神文化成果通过一定的程序与方式转化为人的内在本质力量,丰富和促进整体精神世界和全面自由发展。

(2) 文化赋予人性与生活以超越性特征。人性具有复杂的结构,即作为生物性需求的“自然性”、社会本质需求的“社会性”以及精神提升需求的“精神性”,这三个维度分别构成教育“先在的人性前提”“最根本的人性基础”“最具发展性的人性基础”^[14]。古今中外的文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基于人性预设而展开,并论证教育的必要性与根源性^[15]。文化及其精神规定性补偿了人的生物性不足,从而彰显出人

类自我完善、超越自然的本性,文化规定性被认为是人的第二本性,正是文化塑造了人之为人的东西。

(3) 科学和人文是人类理解、把握包括外部和自身世界之紧密关联的两种方式。科学和人文是文化内涵的两个子系统,而生命价值通过人格结构与文化模式的整合得以展开。一方面,文化是在科学和人文两大因素的张力中,为摆脱生存困境或对人类生命与生存状态所提供的解释系统;另一方面,社会关系的发展既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构成其外在的制约因素。若“环境条件是持续的压力”则“生存动力的选择行为,就会通过在社会中调节个人的人格结构的文化适应过程得到反映”。一方面,“一旦意义的文化模式被内化到某一个体的人格之中,它们也会界定动机结构化的情境”;另一方面,意义的文化模式与人格结构间的相互建构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整合”,包含能够产生认同的情感纽带。文化与人格、社会的相互建构与整合,在主体的心理认同结构中相互交织。

2. 文化体系蕴含意识形态和文化性的双重属性

思想与核心价值作为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马克思指出,“如果从精神生产者的不同类型,从精神生产活动的不同方式来看,‘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则包括一切非统治阶级的、独立的自由精神生产者的活动”^[16]。马克思的文化理论不仅蕴含广义“人类学的文化观念”,即指自然的人化、人与社会的实践存在方式,还蕴含狭义“价值标定的文化概念”,即以意识形态为内容的观念结构,意识形态与文化属性相互作用。

(1) 意识形态是文化发展的核心与指导。意识形态作为较高层次社会意识,其合理性最重要的体现是价值合理,其价值观形态是文化系统的核心和本质。文化的社会作用及其经验表达,不是纯粹符号行为,而是与观念和思想体系的价值规定相关的社会行为,受到意识形态的筛选;反之,意识形态通过精神层面各个分支结构,形成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并发挥自身的价值导向功能、理想信念导向、奋斗目标导向和行为规范导向的作用,“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教育人功能,同时使一部分文化的教育和传授得以完成”^[17]。

(2) 文化形式影响意识形态功能的提升。文化对于意识形态的形成、存在和发展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意义。意识形态是存在于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中的本质属性,并通过这些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表现出来。因此,把握意识形态呈现方式、功能及其在社会文化中的转化机制,有助于将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转化为统一的文化心理和精神信仰,从而提升为意识形态属性。主流文化的价值理性越充分,执政党的政治主张、理论学说和价值理想及其制度化体系就越获得认同;蕴含主导价值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活动越丰富,意识形态控制力就越强。

3. 思想文化创新生产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内在要求

作为文化发展中的集体精神状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精神状况,“现实地反映并深深地影响着其文化发展的实际进程和客观态势”^[18],一个时代的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一种新思想、新理论乃至价值观也“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的事实中”^[19]。这一文化“历史的自然”现象表明:社会物质生活会以自己曾经创造的现实需求、实践方式和主体属性,规定或制约着当下的实践以及主体经验对历史精神文化信息的价值理解、内容提取,并重新激活建构,从而形成特殊的利用方式。因而,文化传承也是一个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重新界定文化和认识文化的过程,不仅确定一种文化价值,而且还要增殖和赋予新的文化意义。

(1) 思政课具有推动文化的延续与创新功能。这一功能具有两个基本的层次:一是文化传播、文化延续与更新的必要手段。与特定阶级意识相关的文化变迁,不是通过辛勤创建全新的文化范式,而是通过对已有的实践和观念进行重组(reorganization)、重新解释(reconstructing)产生的。思政课正是承担着这种文化传播、认同建构和意义解释的精神生产功能与体制化的重要形式,并把文化和社会制度、文化政策联系起来。二是适应特定历史条件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处理精神文化价值观建构中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关系。

(2) 思政课引导文化价值的正确方向。任何一种社会文化都是一种多元化、体系化的结构形态,主导性文化价值决定着文化的根本性质和总体特征。思政课素质教育在实践中应着力于呈现文化中的主导价值或核心价值的引领地位,从而承担着甄别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维护主流文化、批判整合多元文化和创造先进文化等文化价值功能,在社会文化建设中凝聚社会共识,并推动先进文化形态的持续丰富、大发展、大繁荣。此外,大学生对于特定文化价值的认同状况,构成思政课育人实效性的评价标准体系。

(二) 思政课落实素质教育的机制与困境

1. 思政课落实素质教育的文化机理

高校思政课素质教育目标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蕴含着教育活动的自觉性与文化的自在性、教学内容的时代性与文化的相对滞后性、内容目标的先进性要求与文化形态结构的具体多元性等矛盾运动。特殊矛盾决定了高校思政课开展素质教育活动的特殊规律机制,即促进文化体系的“应然”价值与“实然”目标的相互转化过程,实现意识形态自觉与价值理性认同的生态性整合,完成主体的内在心性秩序、价值实践方式及其行为约束机制的社会化过程。

(1) 大学生基于精神文化需求,对先进的思想理论和文化价值体系的内化与认同建构乃至精神信仰的生成,“承担着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与整合作用的有效发挥以及其对于社

会制度的合法性基础的论证功能”。文化象征着社会的意义、价值和体制,促进受教育主体进入生活世界的符号化结构即文化系统,进入由累积而来的文化知识所建构并在社会中积淀、结晶而成的观念系统、价值体系、知识框架,持续获得“合理的生活指导的意识结构”。

(2) “基于社会主流价值要求与个体思想政治素质现状之间的特殊矛盾运动,促进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建构,塑造主体性人格”^[20],同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文化建设产生正向性影响。这一微观机制,是通过特定大学生个体的思想意识与价值信念的调控与转化,或形塑特定个体成员的人格心理、行为表现而发生作用,对主流文化价值统一化规约的精神生产过程、精神文化需求的心理差异性、精神生长的自主性创新过程的统一。

2. 思政课落实素质教育的难点问题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尽管大学生对思政课的评价持续向好,但其实效性 with 期望还存在差距,因而有待增强^[21]。当前仍然存在一些制约思政课教学素质教育目标的实现、落实立德树人的难点问题或因素。

(1) 教学过程中意识形态与文化属性的二元分立。赋予思政课以文化本质属性,并不是弱化其政治性或意识形态功能,而是根本上把“政治性”看作文化属性的构成性维度,这符合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凸显思政课相对于其他课程育人方式或存在形态的独特性。意识形态研究的文化转向,认为文化与生产完全融合并已经成为一种“构成性的社会物质力量”,“真实的世界已经被文化所渗透和占领”,因而需要一种文化的阐释以补充“总体性”范畴,从而把意识形态还原为搁置“真假论证”这一“日常生活的认识论”问题,功能性的“文化意识形态”削弱甚至取代实体性意识形态建构,“淡化”或“消解”了意识形态观念。在此背景下,思政课素质教育实践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对文化机制缺乏足够的重视与回应,不恰当地理解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内在于社会存在总体含义、伴随着人的全部现实活动这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以及作为我国当前文化实践必然要求的含义,把复杂的社会关系体系简单地归结为思想关系或政治关系,而走向“泛意识形态化”,造成文化形态的僵化,阻碍文化的正常发展;二是造成了这样一种困境,即提供政治系统获取合法性基础的文化解释以促进政治情感、政治认同的规定性发生了变化,在理解和分析社会结构和制度体系时,持“一切都是‘文化’”或“‘文化’就是一切”的泛文化决定论,从而割裂意识形态与文化性的统一生态,在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以广义文化概念僭越意识形态应有的政治功能,导致“去政治化”或以“文化”消解意识形态功能,而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是一些学生对于核心价值的精神信仰与理想信念的弱化。

(2) 素质教育整体性与唯理性教育文化模式的冲突。思

政课素质教育目标的结构生态所体现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目标,体现着作为占有自己本质的丰富性,这意味着对畸形、片面、失衡发展的摒弃,提升人们理解与把握“整全性”生活的能力,建立并遵循以人为目的的生活法则,实现对人的尊严、价值和主体性的确证与张扬,帮助受教育者以自由自觉的活动摆脱物的存在方式,成就整全性人格。

当前仍然存在的唯理性教育文化观影响思政课素质教育目标。唯理性教育文化观的主要问题在于:传授理性知识以培养单一的理智能力、不注重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忽略对知识所承载的价值意义的发掘以及价值形成力和文化创造力的培育,从而表现为明显的功利主义或工具主义倾向,不能帮助受教育者形成健康而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

一方面,工具主义教育不能强有力地促进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内化,使受教育者在认知和价值理性方面发生畸变,割裂素质结构生态。其文化根源是客体的物质文化与主体的精神文化的分离乃至对抗即所谓“文化悲剧”,其实是文化外在形式与精神内容或“生命与形式”的二元分裂。这一分裂从价值系统的深层销蚀文化主体的创造性动力,使社会文化生活脱离原有精神生产技术基础上的既定逻辑与价值秩序,这也正是现代人“有知识,不文化”的根源性依据。马克思对文化精神的异化进行过深刻批判,他说“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22]或者是有些思政课教师仍然未能完全摆脱唯理性教育文化模式,将文化等同于知识,形成理性与情感、知识与价值、“才”与“人”、确定性知识与不确定性知识、维持性学习与创新性学习的冲突等。

另一方面,工具主义逻辑与文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结合,则更为深刻地影响着核心价值认同。资本逻辑扩张的工具性力量可能造成不同文化间界限的消失甚至民族文化系统之核心价值认同的弱化或解构,最终威胁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文化根基,在遭遇不同价值体系或外来文化时,则可能导致民族文化危机甚至历史虚无主义。

(3) 个体的个性化自由与社会要求主体化的矛盾。

一方面,人的个性是由体力、智力、思想、情感、意志和性格等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组合体,没有个性化就没有创造性,人之为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类的文化创造过程就是从类特性出发作出价值判断和选择而趋近价值目标的过程,即“人在外化范围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23]。因而,素质教育的实施必然是一个促进受教育者智力、体力和个性充分自由发展的过程。思政课落实素质教育目标蕴含这样的规定性,即推进生活方式创造与个性化的自由自觉。

另一方面,个性化内在地蕴含着社会要求主体化的要求、素质教育社会化与个性化的统一。社会要求主体化是教

育者对社会主流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内化、受教育者对社会主流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及信仰及其向意志行为的现实转化形成行为习惯等过程的统一。社会要求主体化为个性化自由发展提供思想支撑,所体现的精神引领和价值追求规约着个性化在自由发展过程中的正确方向,然而,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其一,基于对个性的不当理解,在文化价值多元背景中放任个性和思想任意性从而弱化价值共识,偏离思政课的价值目标与正确政治方向;其二,主体性人格的目的性生成,其基本内核是核心价值规范与精神信仰的内在统一。信仰的精神本质是意识与意志的统一、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一致。由于认知与情感意志的个体差异,基于不同价值形态共存而形成的价值层级与价值冲突,可能使个体处于价值困惑或价值抉择的困境中,可能造成观念认同与现实行为的冲突,导致主体心理上的矛盾、认知悖论以及价值选择的困境,即个体在理解性的主观意义框架中,更可能注入“因社会比较和社会传染而形成的复杂心理机制”,进而在行动上无所适从。

(4) 思政课素质教育要求与社会环境的协同困境。思政课素质教育目标反映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社会、阶层和个体的共同利益要求,而在思想政治道德素养层面的教育要求更是主导思想政治道德要求的具体化。

一方面,思政课教学的逻辑起点是教育对象的认知和思想政治素质状况、内在精神世界发展需要与教育要求之间的矛盾,这些要素的个体差异性既决定着思政课教师对于教育内容的选择,也制约着传授该教育内容的方式方法,从而使使得思政课素质教育过程具有复杂性、多端性、渐进性与反复性相统一等特点,不仅受教育者素质结构中认知、情感、意志、信念和行为等要素的发展方向和水平以及这些要素在教育对象整体性素质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一定的不平衡性,而且教育对象的思想行为状况具有多变性。

另一方面,教育对象所处社会环境是其素质差异及其构成要素矛盾运动和教育要求的客观制约因素,而其中文化环境与人的思想政治素质较之其他环境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从而有着更为明显和突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思政课素质教育要求“既源于现实社会的发展趋势,又高于现实社会的‘现存’,因而不仅具有了超越性、超前性等特点,而且使得教育要求与社会环境之间既存在一致性的方面,又存在差距或矛盾性的方面”^[24]。其一,思政课所体现的社会主导教育要求与受教育者所处场域的一些社会群体、阶层或个体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之间的不一致乃至存在一定的冲突;其二,思政课教育要求与家庭影响、社会组织影响、大众媒介等影响源的不同步性、不协调性。这样,思政课教育影响与某些环境影响对于受教育者产生逆向反差,引发受教育者对于教育要求的内心冲突、价值认同的弱化和行为抉择困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思政课的教育效果。

三、高校思政课落实素质教育目标的实践逻辑

(一) 促进思想性和情感性的融合, 强化核心价值认同

文化既是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和结合纽带, 也是其心理特征、风俗习惯、价值取向及道德规范的综合反映。一方面, 文化以价值观为核心内容, 从一定意义上说, 文化就是社会共同承认的价值观与意义体系的集合从而蕴含着思想性; 另一方面, 文化具有调控经济价值关系和政治价值关系的功能, 较之经济和政治更深刻、更广泛、更持久地调控着人们的利益关系和情感关系。当前, 文化体系发展呈现出的文化情感化与情感文化化, 使得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关联更为密切、深入与融合。

情感不仅是一种动机力量, 使人们的主观体验有序, 赋予人们的行为力量, 而且具有正与负之分, 从而情感也蕴含着价值属性, 规定着师生互动的质量。因而, 引导情感的正向转化与提升, 须坚持融入正确价值理念。在此意义上, 思政课要有效落实素质教育目标, 首要的就是解决价值观问题, 不仅需要在内容上体现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要求, 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 而且应在教学设计上突出情感性, 时刻关注教育对象的思想动态和心理情感变化, 注重情感性和价值性的实现^[25], 促进受教育者把思想认识和情感变化纳入社会的主导思想中, 澄明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促进主流意识形态或主流文化所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学生的认识、情感、意志、信念及行动, 确立共同思想信仰和核心价值认同, 形成共同的精神支柱与价值取向, 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有序性。

1. 将意识形态与文化性有机统一起来

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兼容发展, 是人类走向自由、文明和真理的前提。文化史表明, 意识形态与文化相容越多, 文明冲突和社会冲突越少, 而二者相容越少, 则文明冲突和社会冲突可能越多。就素质生成机理而言, 个体内在的知、情、意、信、行等诸要素辩证发展过程在一定的文化场中进行, 从更为深层最基础性和广泛性的层面赋予思维模式、伦理规范和审美情趣。德国著名文化教育学派的代表人物斯普朗格说“所谓教育就是有意识的文化活动。”列宁也指出“政治教育务必要能提高文化水平。”

在思政课素质教育实践中, 一是不能弱化政治引领和意识形态功能, “为了培养人、改造人和使人们能够符合他们的生存条件的要求, 任何社会都必须具有意识形态”。思政课不能以那种所谓“人文意义”或“人文关怀”将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化”“价值中立化”“价值无涉化”, 从而消解了其意识形态性, 更要避免“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倾向, 认清西方社会所宣称的“普世价值”这一话语逻辑中的意识形态本质, 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二是避免意识形态泛化或以意识形态属性替代文化属性。意识形态的现实控制力需要

文化作为桥梁和纽带, 通过文化心理而发挥作用, 脱离文化语境和文化心理、文化载体去抽象谈论价值观和理想信念, 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思政课教学应发挥“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 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26]。这种认同既源于国家或社会政治目标或者说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或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 也源于一个组织的共同信仰或目标。

2. 坚持一元先进性要求和创新性原则

一种具有生机与活力的文化, 不仅需强化自我更新机制, 而且致力于保持自身主流文化和价值体系免遭外来文化的侵蚀、破坏和颠覆, 确保文化安全。

(1) 应选择既能够反映时代价值精神又符合主流价值观念的教学资源或内容。在价值观多元共存和碰撞境域中, 思政课教学需要坚持政治主导、价值主导及其学理性阐释的有机统一, 增强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其一, 最根本的是高度重视思想引领, 扎实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把这一思想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全过程。其二, 加强理论阐释, 将政治性和学理性统一, 坚持思想理论自身的彻底性, 因为“理论本身的欠缺, 导致人们可以远离理论而生活在另一话语体系中”^[27]。其三, 加强价值引领, 把思政课的政治思想引领和价值引领机制转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上, 警惕以所谓“人文意义”或“人文关怀”将思政课的属性“价值中立化”, 避免“去政治化”或“去意识形态”倾向, 引导受教育者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价值取向, 更好地将思想道德建设的先进性和广泛性、尊重个人合法权益和承担社会责任统一起来。

(2) 坚持创造性原则需要将情感、理性和社会文化的经验融为一体。思政课在讲授思想理论过程中注重对教育对象进行情感的引导, 实现情感“共振”, 保证其在摄取知识的过程中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并融入情感性因素。创造性素养有其深刻的生理心理学—哲学文化学的基础, 呈现为能力系统中多维要素的“互补结构”, 即抽象与形象、理性与情感等构成的张力系统, 而且注重在“教材体系—教学体系—价值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上下功夫, 既进行思想的精神生产和创造, 准确把握教材中知识原理重点, 发掘这些知识中所蕴含的价值意义, 又增强课程教学与社会实际、学生生活以及已有经验之间的联系, 并对这些信息进行提升和概括的学术化处理, 保证教学内容的理论化和系统化。

(二) 坚持生活化与超越性的统一, 提升理性辨识能力

思政课教学的生活化逻辑缘起于文化变迁, 其价值本质在于: 不仅促进受教育者在经验性情境中实现由自在生存到自由自觉生存、适应性生存到反思性生存, 涵育超越性人文

素养,而且促进“知识—能力—素质—行为”的辩证转化,这是思政课落实素质教育的规律机理,从而解决个性自由与社会要求主体化的矛盾。

文化与受教育者的生活经验、利益诉求、心理认同具有深刻的契合一致性,而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认知状况、受教育者的思想实际是思政课教学展开的逻辑起点。一定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及其趋势所提出的由教育者所掌握的思想政治素质要求与受教育者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状况的矛盾^[28],是思政课教学的基础依据,若脱离现实生活和传统文化以及学生思想状况去抽象谈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一方面,生活化逻辑应遵循文化传承、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个性社会化的需要,为主体提供文化传统和解释力量,表达人性在给定的时代所达到的自主自由程度;另一方面,坚持生活化逻辑的精神超越性要求,将思政价值观导向渗透到丰富多彩的群体化生活实践活动中,成为实现价值导向与学生自我教育相统一的有效形式,避免形式化或无主导性意义的“泛生活化”。

1. 结合生活实际培育“积极—理性”的反思意识

(1) 思政课不能成为抽象的思想政治宣传的僵化工具。高校思政课教学应通过生活实际和学生生活或思想实际来折射理论的魅力、体现理论的真理力量,不仅要结合时政热点问题和学生生活与思想实际,赋予教学内容以时代性和针对性,增强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度,而且要关注学生生活实际,以学生为中心展开教学内容的设计与优化。

(2) 思政课应培育“积极—理性”的反思意识。超越性人文精神生活在本质上是反思性、批判性和实践性的。缺乏反思性意识将使人们对生活世界缺乏真知灼见。生活世界不仅呈现文化、社会和个性三者组成错综复杂的意义域,而且具有非反思性的自在性特征,因而是一个经验与本质、善与恶共存的空间。思政课作为涵育真善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应克服两个不当倾向,即模糊自身与生活世界的界限、混淆理想的精神价值生活与现实的感性经验生活的界限,以引导学生趋向超越性的精神生活。为此,需要培育学生“面临任何事情都易于作出明智判断的心性”,在学生对于自我社会性的分析中,强调在个性发展与批判意识中“赋予每个人促进普遍利益的志趣”,具有公共服务与责任意识的“公心”,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在多元价值观念共存的情形下保持清醒的头脑,提升政治鉴别力和增强政治敏锐性,正确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现象,批判与矫正错误的思想观念,从而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社会主义信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

2. 抵制大众文化世俗化商业化的消费主义倾向

大众文化形成的深层根源是价值观变化,一方面表现为规范性“价值层级系统”中的价值秩序异位,并为大众时尚所左右即“审美文化的相对剥夺”,人们“误以为实现着自己意

志和要求的消费活动,实际上正在压抑个体的意志和需求”^[29],这是生命活动和生活中最深刻的不自由;另一方面,资本逻辑通过消费主义发挥导向作用,把物化价值当作价值实现的基本方式。“文化的商业化破坏了文化的真实含义,这将损害文化的精神属性和历史价值”把文化引入歧途,损害个体的自主权,商品化的世界不提供一个象征空间来使人们能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批判性反思,来发展自己的个性和自主性。因而,思政课要借助典型案例,旗帜鲜明地引领正确的文化立场与文化选择,矫正人们观念中的价值偏差,深入把握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及其在文化上的表现形态,克服市场机制与资本逻辑自发调节给文化生产可能带来的价值偏颇与逻辑扭曲,保证社会精神文化生产的正确方向、社会价值与有效发展。

(三) 推动文化场与公共性的融构,涵育深沉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人文信仰、人文精神和立身养德之本,指向文化归属的共同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独特精神标识。一方面涵盖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守望、传承与超越,是作为个体的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下,对价值共同体持有的高度认同,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主要是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的结果”,这是与历史文化变迁相联系、通过历史积淀而植根于深层意识中的心理建构。中国历史发展中民族融合形成的“多元一体”文化生态是国家认同的深层历史根基,“不仅奠定了中国在古代的辉煌历史,而且为中华民族在当今的伟大复兴确立了集体认同的基石”^[30]。另一方面,促使人们对共同体的认知朝着积极、正面、良性方向发展,或促进认知逻辑向基于价值认同的实践理性转化,蕴含着现代公民意识和社会意识的统一以及个人追求与社会目标统一的深沉信念、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思政课应着力营造涵育家国情怀的文化价值共享空间或“文化场”,培育公共意识和文化公民身份。

1. 营造“显—隐”结合的文化育德积极氛围

文化属性最大的特质是具有极强的渗透性、持久性、广泛性,通过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地赋予人们一定的思维模式、伦理规范和审美情趣,更为持久地制约和规范着个体的行为与价值观念体系的构建以及个体行为和社会活动,这也是思政课文化育人、以文化人的内在机理。家国情怀教育需要营造“显—隐”结合的文化育德氛围,充分发挥文化渗透的特有作用,遵循素质生成的基本矛盾规律,即一定社会的主流思想要求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水平之间的矛盾运动,在一定文化环境影响下促进个体内在的知、情、意、信、行等诸要素辩证转化。

(1) 旗帜鲜明弘扬主旋律,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帮助受教育者确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激发民族性的觉醒。中华文明“孕育了中华民

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的崇高价值追求“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31];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革命文化,既是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产物,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红色基因和直接来源,汇聚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优良精神传统。

(2) 发挥文化资源隐性育人作用,促进教材体系向教育体系再到价值体系的转化。其一,避免将文化资源单一化和教育形式僵滞化,从而将文化素质提升从思政课立德树人的价值目标中分离开来。要适应时代和社会转型中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要求,致力于文化资源的拓展与整合,将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创造、文化传播中,形成弘扬优秀文化、抵制腐朽和落后文化的氛围和机制,形成文化艺术与思想理论在素质教育中的合力效应。其二,创新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载体、实践和仪式,建构渗透式、陶冶式和体验分享式的课堂运行模式。一切民族国家都试图通过一些有组织的传统典礼和仪式的转化、共享民族遗产等方式以建构民族意识。因而,思政课要围绕素质结构要素及其优化等目标,研究各种思政元素的特点,整合文化熏陶、社会实践、宣传教育、红色网站、理论宣讲、辩论活动、设计情景剧等载体,发挥其整合效应、放大效应和感染效应,促进主导性与主体性的统一,实现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文化资源的有效运用,“必然把人的思想、信念、价值观等隐性文化中表现出的精神形态作为自己所要塑造和激励的对象,即在文化中关注人们‘精神生活’,‘这是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形态力被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因’^[32]。

2. 引导受教育者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与生成

思政课的文化育人实践需要坚持传统性内容和现代性元素相结合,使受教育者不断从传统文化中获得精神养分,涵育家国情怀,同时整合现代元素以提升自身的现代化素质^[33]。特定社会的文化特别是先进文化所预设的是公共领域,寻找价值规范共识,确立公共意识和正确行为方式,培育改革创新精神。思政课应该着力于对学生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与引导。

(1) 现代国家公民意识是法律意识与公正意识、公共意识的统一。公共意识是相对更高层级的公民意识,因为其深深植根于哲学、文学与社会文化的传统背景。公共意识涉及三个基本层面^[34]:其一,公共意识不仅是指社会事业的参与,而且为共同利益着想的文化上的公共意识更为根本与深入,看重所在共同体的语言和文化,认同并努力承担起保障其得以传承与传播的责任;其二,社会公共意识驳斥现代社会中个人主义或原子主义的离散性,强化义务与责任意识;其三,作为国家公民的公共意识有助于提升所在共同体的评

价,增进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共同体意识与民族认同。

(2) 现代国家公民意识涉及恰当的文化公民身份意识的培育。文化公民身份涉及民族国家与民族文化的认同、文化多元主义与民族文化的关系、文化意义建构和持久性的民族理念,涉及民族文化生活过程中的包容性参与,关系到自我与世界性、反思性和异质性诸多文化实践的批判性耦合。在今天,中华文明所涵育的家国情怀,还应有其拓展的世界历史价值意义和胸怀。在开放多元的背景下,思政课既要强调民族意识,又要培育世界意识与合作意识,引导学生改革精神与创新精神,正确处理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形成与开放社会相适应的价值理念。民族文化日益运转在新的文化环境和文化要素中,并被建构为多样性形态的文化认同域(cultural zones of identification)。而值得强调的是,民族文化向度依然是现代性范围内认同协商必不可少的中心和民族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源泉。

(四) 保持治理性与体制化的协同,塑造健全人格结构

人格是一个人心理特征的总和,既包含人的品德,又包含知、情、意、行多方面的特征。“现代社会的个人应该拥有完整的人格能力,而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人的完整人格的基础”,“完整人格是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外在表现”。正是文化把人们从不愿思考的行为习性模式中解救出来,并启动了“自由自我的建构程序”,通过个体的个性意志力量克服习性,由此开启自我重新构形的自由治理目标,从而使得习性观念成为自由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占有重要地位的人格结构的组成部分。

这是一个社会化过程,不仅是帮助受教育者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更重要的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个体内化,帮助人们建构合理的自我认同或人格同一性。在这里,文化的制度化体系设计了人格完善的方向,社会与价值观念体系赋予行为以意义的“实践、制度和理解的背景”。处于这一背景中的文化价值意识包括伦理道德观念成为个人、体制和国家的规范基础,然而,若没有文化所提供的最深刻、最基础、最广泛的支持,这种价值意识和道德信念则可能缺乏持久性与稳定性。由此可以看出,形塑人格的社会化,具有内化与外化的双向过程:内化作为心理机制,涉及制度化关系连接而成的社会性系统、文化系统和人格系统的相互建构;外化本质上是主体从动机到行动的价值承担,并将价值体系与社会体制、日常生活相互融合,通过社会体制和日常生活得到具体的落实。

1. 在文化心理建构与体制化规范体系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

高校思政课应坚持以“直面文化实情的韧性态度”,审视因时代与社会变迁所造成的“文化内部冲突”以及思政课教育目标和内容的阶段性特征与历史性变化,进而协调成为时代性的整体价值体系,因为“一种信仰只有求助于智慧的理

解”而且“也只有重视时间和变化,使作为主人的人面对世界、历史和人生,才能继续存在下去”这体现了通过自我认知、社会适应、精神动力、人格塑造等心理健康教育功能提升育人的整体效应^[35]。

(1) 引导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积极地看待文化与权力的某些关系”。在社会的制度体制背景和特定知识框架中行动,如何组织和利用文化资源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建构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遵循特定的制度化价值模式培育个体人格结构。一个社会关于正向价值的观念,关于以合乎道德的行动、行动意向、行动条件或行动模式等呈现的规范范畴的观念,要熔铸到制度体系中,必须牢固地整合为个体想当然接受的行动取向。

(2) 根据受教育者素质生成的特点和规律展开教学。整体性素质生成过程具有实践性与导向性、复杂性与多端性、渐进性与反复性等统一的特点,因而需要对各种类型育人环境影响作出选择和调节,运用体制化力量抵制消极因素影响,转移社会环境影响的某些因素,使其纳入思政教育人的主阵地和主渠道;根据受教育者人格结构中认知、情感、意志、信念和行为等发展方向和水平以及这些要素在整体素质形成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平衡性,正确分析受教育者的思想发展动向、把握教育时机;结合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过程的历史性特征及其对受教育者思想政治素质要求的变化,适应时代特征和社会需要,适时调整教育理念和设置具体教学目标,选择恰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

(3) 积极构建和谐的心理和人际氛围以创设思政教育人的良好人文环境。人际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我评价、自我肯定实现的重要体现,通过人际交往可不断提高自己的自我意识水平,增强社会适应能力,而人际关系的失衡必将导致人的心理失调与价值观的偏移。思政课必须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学生观,积极创设和睦情境,通过课程、讲座、咨询、讨论、学习小组等形式,指导学生学会交往,引导学生建立相互理解、关心与信任的人际关系^[36]。

2. 在文化结构与国家的关系中增强对制度体系的情感认同

稳定而健全的人格结构有着深厚民族文化的根据和支撑。文化对于社会生活赋予意义与价值选择具有根源性意义,而文化价值认同融构了群体内共有的世界观、价值体系、态度和信仰,成为基本心理经验的表征,体现着对特定社会文化、共享价值以及象征符号的认同与归属意识,在根本上维持着人格结构中的恒定性要素和人格同一性。通过集体人格及其独特的文化,民族认同感为个人在世界中的自我定义和自我定位提供有力的方式。

(1) 思政课须肩负起传播国家意识形态以引领社会文化的使命担当。坚持政治性与文化性、先进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高标准高规格设置教育目标、选择教育内容,使学生的

思想认识纳入主导性思想文化体系中。意识形态建设服务特定阶级、政党和社会的功能发挥越明显,“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持力度会越大,对文化发展的引导力也会更强”^[37]。同时,思政课必须旗帜鲜明反对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促进有意义的先进文化价值选择。自由主义坚持中立性原则,因其固守的原子主义信念,不仅不能维系能够提供有意义选择的“丰富多样的文化”,而且最终可能“瓦解支持多元主义的文化结构”与“文化中许多值得珍视的内容”,历史虚无主义则直接解构民族文化和历史认同意识,而使社会制度既不能维持合法性,也不能维系自我决定所要求的共同文化背景。

(2) 思政课应着力探讨育人环境优化的根本途径。思政课必须呈现社会制度引导社会公共伦理的价值性。一是随着社会交往广度和深度的拓展,现代社会出现了大量的公共生活领域,必须重视制度的先导和保障作用,通过国家力量规范和约束教育对象的行为,从而间接地影响其思想道德观念。社会制度的价值性和合理性内涵积极的时代精神,可以通过规范的组织形式、运作程序、权利义务安排,默示和鼓励正确的价值原则,蕴含着社会成员基本的行为之“道”,从而成为形塑人格同一性的道德空间。二是重视受教育者的精神培养,坚持正面引导,讲述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正能量事例。呈现文化及其制度化价值所蕴含的“应然”承诺与“实然”目标相互转化的历时性、阶段性特征以及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引导学生把握文化的价值承诺与文化价值的理性认同、文化价值目标与制度化手段相统一及其相互转化的历史性,形成正确认知与评价政治制度和文化政策的历史观、国家观和文化观。

参考文献:

- [1] 陈宝生.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N]. 光明日报, 2020 - 11 - 10.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3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47 - 348.
- [3] [8] 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8 - 05 - 03.
- [4] 习近平.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9 - 03 - 19.
- [5] 沈壮海. 关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性 [J]. 思想理论教育, 2008(3): 4 - 6.
- [6] 高静. 论高校思政课程的素质教育目标及其实施路径 [J]. 江苏高教, 2021(7): 75 - 79.
- [7] 教育部课题组.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48.
- [9] [美] 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 [M]. 韩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155 - 156, 161.
- [10] 周国平. 人文精神讲演录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27.

- [11][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1-162,205.
- [12]李敏.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属性的本质规定及实践运行[J].思想教育研究,2018(8):22-27.
-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4.
- [14]闵永新.论整体性视野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的价值维度[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1):100-104.
- [15]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源探究[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3):27-35,157.
-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33.
- [17]叶启绩等.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和谐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1-27.
- [18]项久雨,吴海燕.培育文化自信与价值观自信: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着力点[J].思想理论教育,2016(10):18-24.
-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44.
- [20]邵从清.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机理及其实现路径[J].江苏高教,2016(3):124-127.
- [21]沈壮海等.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17)[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5.
- [24][28][33][36]骆郁廷,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122,196,266,129.
- [25]郭凤志.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217.
- [2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2.
- [27]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及其当代挑战[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12):5-13,33,161.
- [29]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66-167.
- [30]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06-113.
- [3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8.
- [32]段海超.略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育人[J].教学与研究,2013(4):102-105.
- [34][德]奥特弗利德·赫费.经济公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全球化时代中的政治伦理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82-84.
- [35]陈君,李莉.论高校思政课的心理健康教育功能[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24):43-45.
- [37]刘克利,罗仲尤.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属性探析[N].光明日报,2012-05-13.

The Cultural Mechanism and its Practice Logic of Quality – oriented Education Thoug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Colleges

ZHANG Ting – gan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 Yancheng 224007 ,China)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quality – oriented edu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logic of “building a high – 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and presenting as structural ecology. Its cultural attribute has profound roots: the life and its transcendence are original related to the culture ,the culture contains the dual attribute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and innovative production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Its realization mechanism involves the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ought to be” and “to be” ,containing many cultural paradoxes ,which suggests the practical logic of quality – oriented education ,that i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y and emotion ,strengthen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re value; adhere to the unity of life and transcendence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rational identification;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field and publicity ,cultivating the deep feelings of family and country; maintain the tension between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shaping a sound personality structure.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quality – oriented education; cultural mechanism; practical logic